

重点大学专项计划学生的非认知表现

——基于“负担综合征”的质性研究

吴秋翔, 李立国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一直以来,专项计划学生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不乏质疑他们高考成绩较低、大学学业表现不佳等声音。然而,劣势家庭背景、早期教育以及受专项计划倾斜等因素亦使通过政策倾斜得以进入重点大学的专项生产生自我怀疑、不自信、压力大等非认知问题。本文通过访谈3所重点大学的专项生,以“负担综合征”为理论基础对其非认知表现进行解读,该理论描述了一种无法内化个人成就、怀疑自我能力、认为自己“名不副实”的心态。研究发现:专项生把成功录取归因为政策、他人帮助、运气等外部因素,诱发了“负担综合征”;他们了解自己缺乏学业与能力准备,希望通过额外努力来弥补,陷入“负担综合征循环”;他们在与同伴比较的压力下倍感焦灼,通过回避比较来掩饰差距;他们拒绝被当成特殊群体对待,因害怕被发现专项生身份而回避受助。研究进一步明确了专项生的独特性,把“负担综合征”作为其显性且特殊的非认知表现,并建议通过加强入学适应辅导、开展团体心理互助、构建正向舆论反馈、积极应对学业失败等途径缓解相应的负面心态。

关键词:专项计划学生;负担综合征;非认知表现

The Non-cognitiv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Enrolled under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at Elite Universities: A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Impostor Syndrome"

WU Qiuxiang, LI Ligu

(School of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Students enrolled under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at elite universities have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the whole society. Many people question their low scores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poor academic performance at universities. Meanwhile, these students are prone to self-doubt, low self-confidence, high pressure and other non-cognitive problems due to their disadvantaged family background, the early education experience and the enrollment of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Through qualitative interview of students from three elit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on-cognitive performance of students enrolled under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mpostor Syndrome. This theory describes a psychological pattern that people are unable to internalize achievements, doubt their ability and believe themselves unworthy of the title. The study finds that students enrolled under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attribute their success to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policies, others' help and luck, which leads to the problem of Impostor Syndrome. They understand their lack of academic and skill preparation, and want to make up for it with extra effort, thereby falling into the cycle of Impostor Syndrome. They suffer from anxiety under the pressure of comparing themselves to their peers and therefore hide the gap by avoiding comparison. In addition, they refuse to be treated as a special group and refuse help for fear of the exposure of their special status. This study further clarifies the uniqueness of students enrolled

under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at elite universities and identifies Impostor Syndrome as a dominant and specific non-cognitive performance of them. It also recommends alleviating the negative mindset by strengthening guidance in the first year of university, conducting team psychological mutual assistance, constructing positive opinion feedback, and facing academic failure positively.

Keywords: students enrolled under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impostor syndrome; non-cognitive performance

一、问题提出

新时代以来,我国实施了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专项计划,通过给予专门的招生倾斜增加他们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毋庸置疑的是,专项计划在帮助弱势阶层学生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机会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有效地促进了教育公平。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专项计划录取的学生(下文简称“专项生”)大多享受分数优惠,其原本高考成绩并不一定达到重点大学在生源地相应批次的录取分数线。例如,2019年北京大学在河南省“国家专项计划”招生中,以高考成绩过低、学生可能无法完成学业为由退档两名考生,虽然北大最后对两名学生予以“补录”,但他们与统招生之间超过100分的录取分差仍是事实。公众舆论从来不乏对专项生的质疑,认为他们的学业表现难以符合高水平大学的严格要求^[1];重点大学招收的是国家精英,应根据高考分数平等对待^[2]。同时,政策受惠学生也可能因降分录取的刻板印象而自我怀疑^[3],认为自己与他人存在“天生的差距”,产生心理的挫败与失落^[4]。“他们(我)真的配在这里学习吗”“没有专项计划,他们(我)还能进这所大学吗”等问题出现在社会公众与专项生自己的脑海中。因此,本文引入心理学“负担综合征”的理论视角对专项生的心理状态进行刻画,通过质性访谈走进38位专项生的内心世界,试图解释家庭背景、早期教育、受专项计划倾斜等经历如何作用于学生的非认知表现,找到他们身上更为独特、显性的心理特征以及内化这些经历的方式,以期更好地帮助这些学生突破潜在的心理困境。

二、理论与文献述评

(一)“负担综合征”的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

1978年,Clance和Imes^[5]发现那些获得成功(如取得学位或学术荣誉、在标准化考试中取得较高成绩等)的女性无法内化个人的成功感,始终怀疑自己获得的成绩,认为自己不配拥有这些成就,是欺骗了别

人,并担心最终会因暴露自己的能力不足而被他人视为“欺诈”(Fraud),例如女学生们经常幻想自己被大学录取是因为招生委员会的一个失误。他们将这种特征表现命名为“负担综合征”(Impostor Phenomenon,或 Impostor Syndrome)^①。经历“负担综合征”的人往往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将其视为运气、他人帮助等外部因素的结果,而非自身的才智与能力使然,或将失败归因于自身的缺点,并持续放大不足^[6]。经历者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自身的才能配不上所获得的成就,因此在成就、外部评价与自我评价的冲突中产生信心危机和理性失败^[7]。目前,研究人员认为“负担综合征”是一种负面的心理特征,是对特定刺激和事件的反应,广泛发生在大学生、专业人士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类人群中^[8],但有着特殊经历的特定人群发生概率更高,如女性、第一代大学生、心理状况不佳者、少数民族裔、低阶层人群以及学业准备不足的学生等^[9-10]。

“负担综合征”的负面作用不容小觑,受其影响的人生活质量普遍下降,抑郁和焦虑症状明显增加^[6],且与自尊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11],会显著降低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12]。经历者会表现出明显的自卑与不自信,很难接受外界对自己成就的赞扬,不断将那些负面反馈导向自己确实存在缺陷、错误或失败^[5],容易产生自我贬低、自我否定的倾向,并由于先前的成功而对未来可能的失败产生非理性恐惧^[13]。他们会不自觉地陷入“负担综合征循环”中:当他们选择面对任务时,会产生过度努力行为并把成功视为努力工作的结果;当他们选择逃避任务时,会产生拖延行为并把可能成功的结果视为“运气”使然。在获得了短暂的心安与好感之后,他们会继续自我怀疑、放大不足并否定成功,周而复始^[5]。这样一种负面的心理状态使得经历者陷入了实际控制其生活、情绪、思想和行为的情景中。以学生群体为例,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平庸、不合格、无能甚至是愚蠢的,这种错觉超越了他们的学术工作、专业职务、领导角色与个人生活^[14];他们常常与其他同学进行比较,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准备不

足,或质疑自己取得成功的原因,从而否定自身的能力^[8],如少数族裔学生会怀疑自己是否因“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而被录取,这些无法内化的情绪使得学生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从而给学业表现带来负面影响^[15];这些学生还容易产生极强的回避性行为,如无法寻找到合适的导师,避免与教职员工和其他同学互动,选择那些资源较少或者标准模糊的课程或学科,最后将自己彻底边缘化^[16]。

(二) 专项计划学生的大学表现

目前,对于专项招生倾斜学生的质疑普遍源自错配(Mismatch)的理论观点,即受惠学生与录取院校是否匹配^[17-18],特别是在中国“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录取中,一分之差会决定学生的录取与否。这种错配思想也导致许多微观研究对专项生大学期间学业排名、GPA、毕业率等认知能力方面的关注,即探讨专项生是否达到了录取院校的学习要求,他们与统招学生或同样来自农村、贫困地区的非专项生之间是否存在学业差距。例如,大量研究都发现专项生大学期间的学业表现存在一定劣势,他们的平均学分绩点普遍低于统招招生^[19],挂科率更高^[18],这一现象在大学初期更为明显^[20]。也有研究认为,从学业追赶的角度来说,专项生与统招生的学业差距从入学到毕业会逐步缩小^[1]。有学者将这种学业差距归因为以高考成绩和受惠分为代表的既有学业能力的不足^[19],或是由生活环境转换大、学业适应程度低等适应性因素所导致^[2,21]。前者依然是一种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再讨论,而后者显然开始关注学生的非认知领域。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重视专项生的非认知表现,尝试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并将非认知表现作为与学业成绩等认知指标高度相关的因素。非认知表现广义上包含人格、思维、感觉和行为模式、态度和信仰、社会和情感品质等^[22-23]。从常见心理指标来看,有研究发现专项生自尊水平低于参照组群体^[24],他们常感到自卑、压力大,认为自己不如人^[25]。熊静和杨颖^[4]从文化整合视角发现,专项生若能从家庭场域中获取积极的情感支持力量,重塑自我身份认同,就能实现学业融入与进步。牛新春等人^[17]用坚毅品质来解读专项生的学业进步,认为他们从入学到毕业时精神风貌有较大改变,其内部异质性取决于大学期间的学业进步。

综上,笔者高度认同应关注专项生的非认知表现,那些我们无法直观地利用分数、排名等指标反映的内在情况亦可帮助我们剖析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长与适应过程,并且一定程度上解释学生的行

为表现。同时,目前对专项生非认知方面的讨论仍然使用常见的分析工具和指标,这些研究确实发现了专项生具有部分显性的非认知特征,但似乎相应的表现与解释同样适用于有着类似经历的其他群体,例如环境转变巨大的农村统招学生或同属家庭经济困难的都市学生,尚未切准专项生的独特性。因此,本文尝试采用“负担综合征”这样一个解释工具,一方面能够在非认知框架下继续探讨专项生的表现,另一方面对标美国有关肯定性行动录取的少数族裔学生心理特征的研究,该理论或能同样解释我国专项生具有的特殊问题。如果专项生真的存在这样一种负面的心理表现,大学就应当思考如何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更好地支持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三、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3所执行(国家、高校)专项计划的重点大学展开,包括1所综合类院校(入选“985工程”和“211工程”)、1所理工类院校(入选“985工程”和“211工程”)以及1所师范类院校(入选“211工程”)。通过焦点团体访谈的方式访谈38名专项生,其中24人通过国家专项计划录取,14人通过高校专项计划录取。访谈内容涉及受访者的报考经历、入学适应以及在学期期间的体验。

四、专项计划学生“负担综合征”的具体表现

(一) 专项生把成功录取归因为政策红利、他人帮助甚至是运气,诱发“负担综合征”

专项生在叙述自己的报考经历时存在明显的共性,几乎所有人都将自己成功录取的原因归结为专项计划的政策优惠与学校、老师的指导帮助。首先,他们承认自己获得了分数优惠,并且意识到与统招之间存在实质性的分数差距。81.6%的访谈对象获得了专项计划的分数优惠,如“国家专项计划降低了20~40分,但高校专项计划给我降了100多分,这让我非常意外(AS03b)”。其次,他们把得以进入重点大学的原因归结为政策红利,即使那些考试成绩已经达到高校统招录取分数线的学生也认为政策让自己选到更好的专业。比如有受访者表示,“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我是进不来的,而且进的是计算机专业,是比较强的学科(BS24b)”。最后,学生们大多使用一种庆幸的口吻,“试一试(AS13a)”“碰运气(AS07a)”“意外(AS03b)”“幸运(CS38a)”等表述频现。部分学生认为自己当时并没有刻意关注专项计划,只是听从老师安排或是随

大流,因为运气好才能够“侥幸”进入重点大学。比如有受访者表示,“在填写志愿的时候,老师突然通知我们,有这个提前批项目,有50%的同学填报了专项计划,大家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AS13a)”。这种依赖运气的心态会不自觉地给他们留下“名不副实”的自我认知,如“我并不属于这里”“如果没有政策扶持,没有别人的帮助,没有运气,我进不了现在的大学”。这种将所获成功归因于政策红利、他人帮助甚至是运气的行为,符合“负担综合征”的基本特征。

(二)专项生了解自己缺乏学业与能力准备,希望通过额外努力来弥补,陷入“负担综合征循环”

通过访谈发现,专项生清楚自己在学业准备和综合能力方面存在的劣势,他们会把这些差距与原生家庭背景和早期教育经历联系起来,如“我们(专项生)的家庭背景大多是工薪阶层或者农民家庭,与周围一些同学的差别体现在思维方式上(AS11a)”。同时,他们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和其他同学区分开来,如“我是贫困专项进来的(BS19a)”“他们城市里的学生(CS28a)”等。这种无意间流露出来的群体隔离意识,恰恰表现出他们在意自己的特殊性,在意通过专项计划录取的经历。

与“负担综合征循环”相吻合的是,专项生希望通过努力这一途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只聚焦学业上的投入,如“别人去参加学生活动、社团,我就去看书做题,感觉比别人多花了好几倍的时间,努力就能看到结果(CS30a)”。部分研究认为,弱势群体学生更注重学业投入而非社会性投入是“出于相对优势的考虑和某种优等生的惯性”^[17,26]。我们的研究同样发现专项生在学业上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与之不同的是,“负担综合征”给出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个体对取得成功的不当归因导致其产生过度努力的掩饰行为。经历“负担综合征”的专项生对学业的投入更多,源于自身因受政策倾斜而产生了“名不副实”的潜在怀疑,对自己能力的不信任和避免他人发现自身能力的不足促使他们不断努力,并且强调成功是努力的结果。即使他们最终获得了一定成就,这个过程也让他们不断处在一种负面的认知中,伴随着每个(行为)周期的循环继续自我怀疑、不安和焦虑,强化了“负担综合征”的固有认识。

(三)专项生在与同伴比较的压力下倍感焦灼,通过回避比较来掩饰差距

把自己与同伴相比较是“负担综合征”的典型行为。一方面,他们通常会高估别人的才智与能力;另

一方面,尽管陷入对自我能力的怀疑中,他们仍然强烈希望自己看起来是聪明的或与他人没有区别^[2]。在与同伴的比较中,专项生形成两种比较的逻辑。其一是承认自己技不如人,感知到来自同伴的压力。比如有受访者表示:“专项计划进来的学生有两种:第一种是成绩好的学生,但进来之后对比周围同学,除了学习好,其他方面一无是处;第二种是成绩特别不好的学生,这样和别人相比,就更一无是处(AS11a)。”其二是通过回避比较,努力显示自己与他人没有区别。比如有受访者表示,“只是通过这个政策进入学校,其他的都和别的同学没有差别(CS38a)”“我也不和别人比,所以觉得自己和大家都一样(BS17a)”,但这种表述与前文他们所表现出的群体隔离意识相矛盾,因而笔者推断这很可能也是一种掩饰行为。与文化社会学的解释相一致的是,面对现实的差距,即使曾是“学霸”的专项生也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试图通过转学或转专业来逃避^[4]。这样一系列的回避行为归根结底还是源于接受了专项计划政策的倾斜,学生的确在意与同伴之间的差距,产生了由“分不如人”到“事事不如人”的想法。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试探这种差距的变化,因为一旦差距缩小甚至消除,就能证明自己配得上所获成就,是名实相符的。因此,这样一种从同伴身上获得的压力与其自我回避的认知给专项生带来极大的心理负担,他们在通过努力获得认可和暂时的好感觉后,会再次回到“负担综合征循环”中,重复自己对成功和能力的怀疑,进而对现实表现和未来发展产生“迷茫(AS15a)”。

(四)专项生拒绝被当成特殊群体对待,因害怕被发现专项生身份而回避求助

如今,“专项生”已然成为一种身份标签。录取环节的分额优惠使得有无专项计划本质上决定着这些学生能否进入重点大学,这更容易让他们对自身的能力产生怀疑。在他们的心中,专项生的称呼犹如一道“疤痕”,害怕被别人发现,想要极力回避与抹去。“英雄不问出处,我并没有把它(专项生)想成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特殊的关怀(CS30a)”“学校没有必要给予特殊的关照,让人平等地发展就很好(AS11a)”,从受访者的这些表述中,我们能够读到一种强烈回避专项生身份的情绪,他们希望通过外界的平等对待甚至是忽略来淡化他人及自己对于专项生身份的标识。他们承认自己在很多方面具有劣势,但仍坚称不需要额外帮助,甚至放弃了那些原本提供给他们们的帮扶机会。有受访者表示,“大家不会太积极地去申请学校

的助学金,也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已的情况……但其实发现它(助学金)就是为我们设置的(AS07a)”“还是想把这个(给专项生的)补贴留给更需要的人(BS24b)”。同样的证据来自A、B两所高校学生资助部门的访谈:学校有针对专项计划新生的奖助学金,但相较于家庭经济困难的非专项学生,专项生申请的比例并不高。这些学生纵使存在实质性的困难,也认为有人比他们更需要帮助。有关“负担综合征”的先行研究描述了经历者存在大量的回避行为,这些行为不仅仅体现在和同伴之间的比较中,还体现在个人完成学业挑战以及良性的师生互动上^[16]。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发现了更为严重的、出自学生主观意愿的回避行为。他们拒绝受助,回避那些积极的、能够帮助他们走出一时困境的援手,因为接受帮助就标志着他们的身份特殊,因而会被区别对待,还意味着外界会发现他们的“名不副实”,虽然这种想法只是他们的自我意识。

五、总结、讨论与建议

(一)研究发现与讨论

本文以“负担综合征”为理论基础,探讨专项生所具有的部分显性且特殊的非认知表现。研究发现:第一,专项生把自己进入重点大学归因于政策红利、他人帮助乃至个人运气,诱发了“负担综合征”。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外部因素,自己就没有能力进入所在大学,产生了一种“名不副实”的自我认知。第二,专项生在清楚认识到自身学业准备不足与能力缺失的情况下,产生过度努力行为,并将所获成功归因于努力而非个人才智和能力,陷入“负担综合征循环”,不断固化这种负面的情绪。与已有研究结论所不同的是,本文认为经历“负担综合征”的专项生学业投入的理由也可能源于对自己“名不副实”的怀疑,是在自我能力的信任危机下产生的掩饰行为。第三,陷入“负担综合征循环”的专项生经常把自己和同伴进行比较,要么承认技不如人而否定自己,要么产生强烈的回避行为,掩饰自己技不如人,在同伴压力与自我回避中逐渐迷茫。这种回避行为仍来自专项生在意的成绩差距,并在成长发展过程中试探差距的变化。第四,专项生强烈介意外界对其区别相待,不想被标签化,害怕被他人发现自以为的“名不副实”,想要获得平等对待,甚至为了回避(或怕被发现)专项生身份而主动拒绝帮助。

笔者常在思考,专项计划学生有什么差异化的特征需要我们重点关注,他们与那些更大规模的贫困地

区学生、农村学生或受政策优惠倾斜的学生有何区别,似乎诸如努力学习、回避挑战等情况也常见于其他群体。若能回答这一问题,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本文要使用“负担综合征”来分析专项生的非认知表现。对此,笔者认为专项生应是一个独立、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独特性一是来自农村和贫困地区,在既往成长过程与资源获取上存在劣势,满足同样出自寒门的学生群体的普遍特征;二是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各自的学习场域中是优等生,尽管获得了一定的分数优惠,但其在原高中学业表现出色,名列前茅^[24];三是获得了实质性的考分优惠,在中国这样一个分分计较的录取机制下,分数是筛选和比较的最直观工具,“分不如人”的事实意味着可能无法获得录取机会。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交叉性影响(Intersectionality),给专项生带来三组意识上的冲突:第一组冲突是生活学习环境的改变带来的冲突,即小村庄、小县城的成长环境到大城市的大学生活情境的转换;第二组是与同伴对比带来的冲突,即在县域中学平民子弟中的出类拔萃与在重点大学佼佼者中的普通平庸之间的落差;第三组是外部评价与自我认知之间的冲突,即作为进入重点大学的专项生在原中学、家乡人和亲人眼中获得成功的“骄傲与尊重”^[25],同他们清楚意识到自己存在实质性分差与能力差距之间的矛盾。这三组冲突叠加在一起,使得专项生自我定位的参照系发生了根本改变,动摇了他们原有的心理建设与认知基础。他们找不到与同伴比较的相对优势,发现不了自己的闪光点,进而只能认为自己是平庸、无能与“名不副实”的。

专项生与同样来自农村或家庭经济困难但却通过统招方式录取的学生以及获得分数优惠的自招生和特长生也有很大差别。虽然那些家庭背景劣势的学生同样遭受着环境变化带来的不适应,但身处劣势的他们能够凭借实打实的高考成绩获得与相对优势阶层学生等同的入学机会本就更加不易,这便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成就感与激励作用,也容易形成一种不甘示弱的神品质。而就那些获得分数优惠的自招生与特长生而言,即使其高考成绩与统招招生相比存在一定分差(特别是文体特长生),但其在学科竞赛、综合能力、部分技艺等方面的特长带来的优势感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考试成绩差距带来的心理落差,自主招生政策原本就旨在筛选常规高考无法识别的特殊人才。因此,对标这些群体,专项生无疑承受着更多重的心理自卑与精神负担,并与其原生家庭背景、早期教育、

高考时的分数差距等因素相互作用,这种叠加的心理负担使得他们落入更为不利的发展境况。

基于上述专项生问题的特殊性,本文使用“负担综合征”的理论视角来解释便具有更好的适用性。从“负担综合征”的形成因素来看,社会地位、养育变量、歧视经历、环境变化和学习者特征都会显著影响这种负面心态的产生^[27],特别是当学生从一个较低阶层(如工人阶层)转移到一个较高阶层(如高等教育机构)时,他们更容易受到这种心理暗示^[28]。同时,外界的歧视与刻板印象也会形成巨大的压力,加剧了“负担综合征”的形成^[29],这些因素都指向了专项生的特征与经历。当然,与西方研究中少数族裔学生怀疑自己是否通过“肯定性行动”等途径而被录取产生的“负担综合征”所不同,这种录取原因是无法被验证的(如族裔、家庭背景等只是美国大学综合评价录取考量的一部分),而在我国的情境中,专项生清楚知道自己是否通过倾斜性招生政策而被录取,了解自己在考分上的差距。这种认识便会由怀疑转向确定,从考分延伸至学生的各种能力表现,强化他们对整体自我能力的否定,导致他们不自觉地认为自己“不配”在重点大学学习,也使得“负担综合征”成为专项生具有的更加显性、特殊的非认知表现。

同时,“负担综合征”可以较好地整合并连贯解读专项生的心理状态与具体行为,包括从自卑、不自信、自我否定等负面心态到过度努力、在同伴与挑战性学习任务中的逃避等。这一理论视角能够将专项生的家庭背景、早期教育、专项计划经历与大学期间的行为表现联系起来,得到一些与以往研究不同的解释。例如,相较于农村非专项生出于“寻找相对优势”“保持学习习惯”而过分聚焦学业投入的情况,本文认为专项生存在类似行为可以有另一种潜在解释,即专项生出于对自我意识中“名不副实”的掩盖而产生努力行为,并试图缩小与同伴间的差距,或者直接逃避比较来应对发展中的变化,逃离自我定位的坐标系。

最后,本研究丰富了以往“负担综合征”经历者回避行为的类型。除了与他人比较、逃避互动和挑战性任务外,专项生还存在回避受助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更强的主观意识,使其错失得以走出困境的机会。经历“负担综合征”的专项生最想逃离的便是自己的身份牢笼,但这个牢笼的锁恰恰是他们的内心。这就意味着对于如何支持专项生的成长与发展这一问题,必须持有与以往不同的思路。目前,鉴于专项生入学后有更大概率转化为贫困生与学困生,高校往往

有针对后两类群体的支持措施,如经济资助和学业辅导。高校的人才培养并不与学生的招生方式直接挂钩,也是出于防止专项生固化身份认知等目的。除此之外,针对专项生所具有的特殊表现,高校应当给他们提供更具针对性且经过巧妙设计的帮扶措施,这些支持不应只是经济上与学业上的,更应关注他们的非认知表现,在淡化专项生身份的同时,直面问题的本源,帮助他们走出心理困境。

(二)高校干预建议

首先,重视新生入学适应性教育,帮助专项生更好地认识自我、直面问题本源。当学生接触到新的环境、压力和不熟悉的情况时,他们会对自己的成功与能力感到不安,容易产生“负担综合征”^[15]。这也就意味着,大学第一年特别是刚入学的阶段对学生的后续发展十分重要。对此,高校可安排专门的导师、辅导员或是有类似成长经历的高年级学生(特别是那些已经获得学业成功的专项生),通过创造平等、健康的对话空间和契机,帮助专项生正确理解自己的特点,挖掘自身的闪光点与潜质,正视自身的不足和可能发生的问题,为自己的成长路径制定合适的策略。

其次,在专业师资的指导下开展团体心理互助,增强专项生的校园归属感。专项生不应成为大学中的边缘群体,他们也是重点大学不可或缺的有机分子。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涉及的三所高校农村生源比例较高(B校、C校均在40%以上),具有劣势背景的专项生并不觉得自己是大学中的少数群体,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的群体隔离意识。有研究强烈建议应使用互助小组的形式来缓解“负担综合征”,通过与其他人的相互倾诉与情感分享,帮助经历者卸载压力^[30]。对此,高校可以在专业心理教师的指导下,开展适宜的朋辈心理互助活动,帮助同学们(无论是专项生还是其他学生)正确认识“负担综合征”,鼓励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敞开心扉、相互理解,让学生卸下心理负担。同时,应鼓励专项生通过参与学生社团、担任学生干部、从事志愿服务等途径融入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增强其非认知能力和校园归属感。

再次,营造积极的“正反馈”舆论环境,助力专项生的信心树立。积极正向的舆论环境与语言表达有利于学生摆脱“负担综合征”,如鼓励他们相信“我会在这次考试中表现出色”,而非“我如何在这次考试中避免失败”,让他们学习如何接受正面反馈,使他们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才能应对挑战^[15]。诚然,短时间内很难转变社会舆论中对专项计划和专项生的质疑,但正

如笔者所相信的那样,专项生也有自己的优势,并且他们原本的高考成绩差距在日益缩小,可以通过舆论宣传与专项生的榜样树立等方式,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正反馈”舆论环境,帮助专项生摆脱刻板印象、树立信心,从而避免自卑等负面心态的形成。

最后,做好专项生成长发展跟踪,引导他们正确理解学业失败。不可否认的是,专项生仍然存在学业准备不足等问题,对这一群体学业表现方面的跟踪和预警尤为重要,同时高校更应引导他们正确理解学业失败。1960年,伯顿·克拉克^[31]提出了“高等教育的冷却功能”(The Cooling-out Fun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即高等教育的一项合理功能是将学生的注意力逐渐从无法实现的目标转向他们力所能及的成就,以减轻失败给他们带来的打击。在高等教育的“冷却”过程中,那些在入学测试中成绩不佳或在课堂上表现不好的学生可以增加补习课程,并由辅导员提供咨询,重新进行发展规划。借鉴这一理念,对于容易发生学业问题的专项生而言,重新审视并制定自己在重点大学的学习目标与发展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允许他们进行合理的专业流动,将自己从过高的个人预期与同伴压力中解放出来,聚焦于那些可以实现的发展目标。同样对于高中教育而言,应当建议学生报考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大学,避免因升学等动机而产生过度投机行为。

注释

①在中文的语境下,该术语被翻译为“负担综合征”“负担症候群”(综合征、症候群是医学上的专业术语,代表了一系列相关症状或特征表现的合集),有时也被直译为“冒充者综合征”“冒名顶替现象”等。笔者认为,使用“冒名顶替”存在明显歧义,并不符合原概念中性的表述,故建议使用“负担综合征”的表达形式。

参考文献

- [1]徐国兴. 跟跑也不易:“双一流”高校专项生学业表现与发展研究[J]. 教育发展研究, 2019, 39(19):8-17.
- [2]余秀兰,白雪. 向农村倾斜的高校专项招生政策:争论、反思与改革[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 37(1):22-29.
- [3]LAAR C, LEVIN S, SINCLAIR S. Social identity and personal identity stereotype threat: The case of affirmative action[J].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8, 30(4): 295-310.
- [4]熊静,杨颖. “重塑自我”的学习实践:专项计划生精英大学学业融入的个案研究[J]. 重庆高教研究, 2020, 8(3):38-55.
- [5]CLANCE P R, IMES S A. The impostor phenomenon in high achieving women: Dynamics and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J].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 Practice*, 1978, 15(3): 241-247.

- [6]THOMPSON T, DAVIS H, DAVIDSON J. Attributional and affective responses of impostors to academic success and failure outcome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8, 25(2): 381-396.
- [7]SLANK S. Rethinking the imposter phenomenon[J].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2019, 22(1): 205-218.
- [8]SAKULKU J, ALEXANDER J. The impostor phenomenon[J]. *The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 2011, 6(1): 75-97.
- [9]PETEET B J, MONTGOMERY L T, WEEKES J C. Predictors of imposter phenomenon among talented ethnic minority undergraduate students[J]. *The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2015, 84(2): 175-186.
- [10]ATTEWELL P, DOMINA T. Educational imposters and fake degrees [J].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011, 29(1): 57-69.
- [11]SCHUBERT N, BOWKER A. Examining the impostor phenomenon in relation to self-esteem level and self-esteem instability[J]. *Current Psychology*, 2019, 38(3): 749-755.
- [12]SEPTEMBER A N, MCCARREY M, BARANOWSKY A, et al. The relation between well-being, impostor feelings, and gender role orientation among Canadian university students[J].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1, 141(2): 218-232.
- [13]BERNARD N S, DOLLINGER S J, RAMANIANH N V. Applying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factors to the impostor phenomen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2002, 78(2): 321-333.
- [14]KATZ C. *If I'm so successful, why do I feel like a fake?: The impostor phenomenon*[M]. New York, NY: St. Martin's Press, 1986.
- [15]HOANG Q. The impostor phenomenon: Overcoming internalized barriers and recognizing achievements[J]. *The Vermont Connection*, 2013, 34(1): 42-51.
- [16]COHEN E D, MCCONNELL W R. Fear of fraudulence: Graduate school program environments and the impostor phenomenon[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19, 60(3): 457-478.
- [17]牛新春,郑雅君,肖瑜. 学业进步对农村学生精神风貌的建设意义——合理评估招生倾斜政策的新思路[J]. 教育发展研究, 2020, 40(Z1):39-49.
- [18]王严淞,马莉萍. “双一流”大学招生倾斜政策下弱势学生发展的追踪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21, 19(1):89-96.
- [19]王小虎,潘昆峰,吴秋翔. 高水平大学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学生的学业表现研究——以A大学为例[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7(5):66-75.
- [20]牛新春. 招生倾斜政策下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学业准备和初期学业表现——基于X大学的实证案例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17, 15(4):52-61.
- [21]熊静,杨颖. 招生政策倾斜背景下农村、贫困专项计划大学生学业适应研究——基于某“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实证调查[J]. 中国高教研究, 2018(7):30-38.
- [22]BORGHANS L, DUCKWORTH A L, HECKMAN J J, et al. The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trait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08, 43(4): 972-1059.
- [23]LIPNEVICH A A, MACCANN C, ROBERTS R D. Assessing non-

- cognitive constructs in education: A review of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M]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24]崔盛,吴秋翔,王明鑫.农村和贫困地区专项招生计划学生发展研究——基于全国8所重点高校的调查[J].中国高教研究,2019(2):34-40,66.
- [25]郭小荷,王敏明.寒门学子的清华一年[N].中国青年报,2013-09-25(008).
- [26]谢爱磊.精英高校中的农村籍学生——社会流动与生存心态的转变[J].教育研究,2016,37(11):74-81.
- [27]BERNARD D, NEBLETT E. A culturally informed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mpostor phenomen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 youth[J]. Adolescent Research Review, 2018, 3(3): 279-300.
- [28]DEWS C L, LAW C L. This fine place so far from home: Voices of academics from the working class[M].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29]COKLEY K, MCCLAIN S, ENCISO A, et al. An examination of the impact of minority status stress and impostor feeling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diverse ethnic minority college students[J].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2013, 41(2): 82-95.
- [30]CLANCE P R, DINGMAN D, REVIERE S L, et al. Impostor phenomenon in an interpersonal/social context: Origins and treatment [J]. Women & Therapy, 1995, 16(4): 79-96.
- [31]CLARK B R. The "Cooling-out" func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0, 65(6): 569-576.

收稿日期:2020-08-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2020年后高校倾斜性招生计划的公平成效和优化方案研究”(BIA200200)

作者简介:吴秋翔,1991年生,男,汉族,上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弱势阶层学生成长发展、高等教育公平与大学招生;李立国,1970年生,男,汉族,山东滨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教育思想史,本文通讯作者。